

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
(法国汉学第十三辑)

目 录

前言	米盖拉 朱万曙(1)
从敦煌到徽州:中国最早印刷品地理分布略论	戴 仁(8)
吴勉学与明朝的刻书世界	贾晋珠(20)
窥见徽州文化的一个窗口——谈明清时期	
徽州医籍的特点	唱春莲(51)
明清时期徽州的戏剧传统与徽州人的戏曲刊刻	朱万曙(95)
晚明徽州墨商程君房与方于鲁墨业的开展与竞争	林丽江(122)
历代休宁县方志	米盖拉(200)
朱熹著作在徽州朱氏的刊刻	徐学林(257)
明刻徽州辣塘黄氏族姓地图及相关问题考略	鲍国强(295)
清末徽州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	陈 琪(328)
明清至民国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刊刻和印刷研究	卞 利(356)
徽州散件印刷品研究	翟屯建(386)
明清时代徽州诉讼文书的收集、整理与出版研究	阿 风(427)
清朝民国时期的善书与徽州社会	王振忠(463)

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

- 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 戴廷杰(542)
- 一座中国山岳的创成
- 黄山:中国艺术里的政治与富裕 周绍明(658)

附录

- 徽州文书研究回顾 阿 风(694)
- 作者、译者的联系方式 (709)

Table des matières

Michela Bussotti et Zhu Wanshu, *Note aux lecteurs*

Jean-Pierre Drège (EPHE), *De Dunhuang à Huizhou : Notes brèves sur la géographie des premiers temps du livre imprimé en Chine*

Lucille Chia (California Riverside), *Le monde de l'édition à la fin des Ming : le cas de Wu Mianxue*

Chang Chunlia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Chine), *Quelques caractéristiques des livres médicaux de Huizhou pendant les époques Ming et Qing*

Zhu Wanshu (Université de l'Anhui), *Les éditions théâtrales des gens de Hui sous les Ming et les Qing*

Lin Li-chiang (Taipei, Université normale), *Développements et conflits dans l'industrie des encres de Cheng Junfang et Fang Yulu, marchands de Huizhou de la fin des Ming*

Michela Bussotti (EFEO), *Les monographies locales : l'exemple de Xiuning*
Xu Xuelin (Membre du bureau de la presse et de l'information de la province de l'Anhui), *Les œuvres de Zhu Xi parmi les publications de Huizhou*

Bao Guoqiang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Chine), *Etude de cas : les cartes géographiques dans une généalogie des Huang de Shutang (dynastie des Ming)*

Chen Qi (Bureau de la Culture de Qimen), *A propos des documents concernant un registre clanique des Chen de Zhuyuan (Qimen)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s Qing*

Bian Li (Université de l'Anhui, Centre d'Etudes sur Huizhou), *Les histoires familiales entre la dynastie des Ming et la période républicaine : rédaction et impression*

Zhai Tunjian (Bureau des monographies locales de Huangshan shi), *Les imprimés sur feuille isolée à Huizhou*

A Feng (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Organisation, compilation et édition de documents jurid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à Huizhou*

Wang Zhenzhong (Shanghai, Université de Fudan), *Etude sociale des livres*

de morale à Huizhou des Qing à la période républicaine

Pierre-Henri Durand (CNRS), *Zhang Chao de Huizhou, lettré, éditeur et marchand à Yangzhou au temps de l'empereur Kangxi*

Compléments

Joseph McDermott (Cambridge University, EU),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Mountain, Huangshan : Politics and Wealth in Chinese Art*

Activités de l'EFEO : A Feng (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Regard sur les études des documents de Huizhou*

Liste des auteurs et contacts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Ouvrage réalis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Français

《法国汉学》第十三辑
《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编辑委员会名单

- 编委：傅飞岚(法国远东学院)
廖育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李学勤(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李 零(北京大学)
邓文宽(中国文物研究所)
朱万曙(安徽大学)
米盖拉(法国远东学院)
吕 敏(法国远东学院)
韩 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柴剑虹(中华书局)
李晨光(中华书局)
孙文颖(中华书局)

SINOLOGIE FRANÇAISE XIII

Livres et imprimés des gens de Huizhou

Michela BUSSOTTI et ZHU Wanshu

Pékin-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Zhonghua shuju

2008

Comité de rédaction de *Sinologie Française* n.13

Franciscus VERELLEN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LIAO Yuqun (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Chine)

LI Xueqin (Université de Tsinghua)

LI Ling (Université de Pékin)

DENG Wenkuan (Institut national du patrimoine)

ZHU Wanshu (Université de la province de l'Anhui)

Michela BUSSOTTI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Marianne BUJARD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HAN Qi (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Chine)

DUANMU Mei (Institut d'histoire du mond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CHAI Jianhong (Zhonghua shuju)

LI Chenguang (Zhonghua shuju)

SUN Wenying (Zhonghua shuju)

前 言

米盖拉、朱万曙

在全球化时代里,不同国家某些人文科学领域由于承继了各自的传统而产生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史与文化史范畴;在历史研究领域如此,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然而这一现象在某些研究对象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印刷品与书籍史。通过抄写和印刷将文字、图像和思想定格在某种可以携带的载体之上,使之既成为每一种文化的“产物”,又成为它的“表现形式”,甚至有时还成为文化本身的“象征”。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就传承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有时还不免带有科学以外的其他意义¹。

编纂本辑的原意是荟集有着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中外作者的研究成果,从而达到一个完整性的述说,但又保持各自观点,相辅相成。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主编者发现无论是时间还是方法都很难相互协调:中国作者的“快节奏”与国外作者的“慢速度”仿佛格格不入;国外作者总体分析的倾向与一些中国作者局部个体的研究似乎背道而驰;本辑各位自由选题的作者,其关注点也未能囊括各个时代与不同种类的徽州书籍。其观点与研究方法自然南辕北辙。这一点主编者从一开始就有所预料,但是没想到作者们的“固执己见”最终却成为了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本编卷首,作为主编的我们就需要一种批判论调:这个论文集不是一个集体合作的工作成果,而是个人工作的汇集,有时甚至存在相互间的针锋相对。本辑文章可说是完全谈不上系统与全面地论述徽州印刷文化。

然而,正是由于没有对某一地区的书业生产形成完整、系统的综述,因而也没有预先设定惟一的研究方向——例如地方史与社会史,或者出版史与文化史,或者印刷史与技术史等等,因而本辑文章的多样性正反映出对徽州研究途径及兴趣的广泛性。文章不一定详尽全面²,但它们却材料丰富、角度多样。

在一些海外作者的文章中,对印刷史和出版史的“徽州角色”有了某些缩小

的定位；由此，也许作者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的看法表现出一个共同特色：西方学术界研究文化史时部分地对于社会研究以及地方社会研究的疏离和废弛。书籍与人都在流动，而这两者作为“载体”而承载着的思想同样也在流动；因此意图将关注点集中到某个地区，尤其是所谓的“本籍地区”（特别是对于像徽州这样一个人口迁移频繁的地区），对研究历史文化的一些学者，其实意义不大。

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学者还是集中在对这片特定地域的研究之上，忠实于地方文献资料——有时由学者们亲自收集所得。在他们眼中，从其他地方而来的更加全面的信息与考量对于当前的课题与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还有，对于那些有文献学背景的作者来说，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毋庸置疑受到了传统目录学与版本学的影响。

当然这种不统一与多样性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读者在阅读本辑各篇文章之时，可以激发对围绕明清两代徽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书籍与印刷品的各种议题兴趣。一些读者的兴趣点是在中国书籍史，文献图画的编纂、生产、传播及保存之上；还有些读者可能更关注古老徽州的历史；本辑中也强调了他们最感兴趣的课题——在所谓的“文人书籍”之外，在徽州还有诸如家谱等民间文献的编纂与印刷品，而论文集里也谈到这些资料；正是由于这些文献的存在，才使得通过徽州文献与印刷品研究社会文化史成为可能。

因而，就是在上述议题里，徽州可被视为某个更加广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至少在书籍史研究范围内，徽州在明末和清代归属于一个更大范围：诸如刷作、文集、医书的出版印刷，明末江南的其他城市亦有参与；而到了清末，善书与童蒙读物则在整个国家各地区流传³。徽州并不是一个“云海中的孤岛”——这是人们喜爱的对于黄山的称呼，而更多是作为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江南地区的一个外围据点，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扩张之时徽州被渐渐边缘化，但同时徽州也更加融入这一地区整体。此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也许它正好可以解释为何很难以统一的方式研究徽州：固然印刷业在徽州历史悠久，作为作者、编者、藏书家和刻工的徽州人在书籍世界里也是领军人物，然而徽州人的书业和书籍活动在很多地区发展（徽州之内和徽州之外，即“小徽州”和“大徽州”），徽州刊刻者用过多种不同的方式，他们也表现出社会多层和不同的水平（官刻、家刻、坊刻、团刻）。在这种情况下，从16世纪末开始已经很难谈及徽州是惟一的“印刷中心”。徽州并不是一个专营外销书籍的乡间中心，而它也不是一个足以在书籍生产中

完全“自产自销”的大型城市⁴。书籍生产并没有控制在少数家族手中——参与从计划到销售整个过程的书业诸多环节的家族⁵。徽州可说是一个书籍世界各类“行动家”大显身手之地,这些人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独立,他们在当地工作或是远走他乡,他们就像徽州出身的著名商人和官员那样,经常东奔西走。他们经常身怀一技之长,但也不是人人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这一点我们从部分文章中可见一斑,并且值得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然而徽州也不总是向外发展的起点,有时也是中途站与回程的终点。黄应光、吴勉学与张潮的祖辈就离开徽州迁居他乡,而徽商则向东发展,如宋公祠便定居在苏州阊门外。但有些人会途经徽州,一些徽州人也会返居故乡,那些书籍、文献与消息则在来来回回传递流动:例如明代家谱中使用的图例符号是徽州本地的发明,还是见证了某种外来表现形式的迅速传播?徽州与别处一样,时有府县官员来走马上任;明代时有士人游历此地秀丽的山水;明清鼎革之际亦有遗民来此隐居;20世纪初则有来自江西的刻工来祁门县工作(当然祁门陈氏宗族的源流跟江西浮梁有关,但是该情况表示一个盛产刻工的地方也会有外来者的参与);民国时代也许还有小贩挨家挨户兜售上海印刷的善书⁶。这些情况再次表明,徽州书业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对于研究者而言,则富有极大的挑战性。

本辑还再次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从哪些方面及怎样界定某一地方研究的局限性。这在徽州研究的层面上更加突出,尤其从“文书”的研究到“文献”与“古籍”的研究以后。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此并不试图给出答案。但同时从另一角度来看,还必须考虑到的事实是“绝对中性的载体”并不存在⁷。人们在移民的同时也带去了自身一部分历史。甚至今天北京的居民也不全是地道北京人,有时需要两代甚至更多时间让外来的“新移民”融入移居地,“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至今尚存。应该看到这样的现象存在,那就是一个新移民尚未被移居地完全接受,然而他已不属于他的原籍了;在这一时刻,他既不属前者又不属后者,或者,他既属于前者又属于后者。经济的迅速发展或是社会的巨变往往伴随着移民大潮,那么亦不难想象明清时代生活在其他城市的徽州人,他们很活跃但依旧从事着祖传的职业,因此维持乡情联系。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象征的意义,尽管他们是出生在南京、杭州或是其他的城市,但他们仍然将自己视为、并继续自称是“新安人”或是徽州各县的本籍人,无疑这已是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之上了。

从整体上来看,尤其是从书籍史的角度来看,本辑的各篇文章展示了对于徽

州印刷品及书籍研究的多样性及复杂性,而这正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有多个层面并且兴衰起伏的社会的反映。即便学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在徽州本地印制的产品,一旦不再遵循传统版本学集中研究善本的方法,那么他们就会看到诸如时贤编纂的地方志与收藏家手中的墨谱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医书⁸,稍晚些还有善书和童蒙课本;清代的这些作品特色与明末书籍特色都不尽相似。时代更晚的还有同一张纸上印刷与手写并存的现象,是出于占卦的卜者之手——尽管现存的这个资料在时间上来说都比较晚,但从文书的性质上我们可以猜想,绝大部分年期早的这类文书都已湮灭无存。上述的文献截然不同,但是它们却都是在徽州刊刻的。这多重资料体现了从士人到一般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与印刷史的关系。

本辑采取以下的组织形式:第一及第二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起到了总论的作用,前者将徽州置于唐、宋代与其他印刷中心相较,后者则是论述明代晚期徽州和其他印刷中心的情况。第二部分重点论述在明代徽州版本中重要的作品和种类:第一篇关于医书,可与前一部分对照来看;之后还有数篇文章,分别关于徽州的官刻、地方志、童蒙读物⁹、戏曲刊刻及墨谱。介于书籍和文献之间很难界定种类的家谱,在徽州通常是制作精良的印刷品,因此值得作为地方印刷史的研究对象。这类不以阅读和传播作为目的的“非书籍”更是史学史和社会史的重要资料¹⁰。从印刷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印证了其形式的多样性。本辑文中个案研究提供的两个实例彼此差别很大,而这并不是完全由于时代差异造成的;第二个实例还揭示出在徽州也有外聘的刻工,这个情况与人们一般观念不同。接下来的是一些“非书籍”的印刷品:下面的两篇文章介绍散印品,及形式成册的文书。其中一篇关注的是善书,这些以散页、小本形式存在的文献,见证了一种地方文字的文化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这些文献大都是印刷品,但并不全是,这也反映出长期以来手写本仍在中国占据着一席之地。尽管这些文本的对象是当地的普通民众,但却有着外部来源。

本辑最后的两篇文章我们以单列的方式介绍给读者。第一篇从篇幅与内容上都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关于徽州的著作中,张潮是不能不提的人物。然而正如这篇文章分析的那样,张潮与他的故乡直接的联系其实少之又少。另一篇则是一篇多年前文章的译文,外国作者在书籍史与徽州研究成果十分重要;该文可说是文化史研究的杰作,它将各类版画、绘画作品联系起来分析,而这些作品的对象都是黄山,——一座在徽州乃至中国都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山。这篇文章的

选题不仅仅具有跨地区的意义,更使本辑扩大了广度。

在附录中,我们增加了有关徽州文书的近期研究的综述¹¹,应该对徽州研究的学者和对徽州增加了解的书籍史学者有帮助。我们在此就不再对印刷史或是书籍史研究进行综述了:本辑中关于散件印刷品一文已经提供了部分信息,我们建议读者可以参阅众多其他有关著作及完整参考书目¹²。

最后,我们向所有支持《法国汉学》出版的机构和个人,向本辑的作者、审阅者和译者¹³,以及赞助部分研究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¹⁴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 释〕

- 1 有些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本辑的中文与法文题目的不一致(法文的意思:徽州人的印刷品)。为此题目编者与编辑来回多次讨论,这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是在中国对徽州印刷与书籍一系列相关或是无关的观念的反映。
- 2 关于徽州书史有两种综论,见徐学林(2005)与刘尚恒(2003)的作品。
- 3 米盖拉在 SHARP (Oxford Brook University, 2008年6月)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为教育而印刷:帝制时代晚期中国地方个案研究”(Printing for Education: A Local Ca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文中,对清代及民国时期不同层次的教育类书籍——《四书》及其他蒙学课本进行了研究。从这些书籍中可见徽州的情况能够与其他地区类比,因为同样版本的《四书》在浙江、安徽南部以及福建北部流传。如1833年版《铜版四书遵注合讲》即是如此,最近在安徽私人 and 公共单位收藏了数本,在法国、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收藏。一些文献是在徽州编纂的,但也有全国随处可见的:如《千字文》与其他杂言。还有诸如流传甚广的明代四川西昌程登吉的《幼学求源》(亦称《幼学琼林》),现存很多版本,例如1820至1850年间由徽城文余堂刻本(婺源董成校注),就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较晚时候还有别的徽州重印本存世。
- 4 徽州既不像福建的“乡间”生产中心(如宋代至明代的建阳与清代的四堡),也不像南京那样的大城市。
- 5 与福建建阳及之后的四堡不同,徽州并不是一个由少数家族掌控了全部商业书籍生产的印刷中心。尽管行业中也存在一些家族参与的情况,如一些著名的徽州刻工黄氏家族等。但是,尽管他们声名卓著,但直到近代,他们仍被视为刻工。当黄利中(义先,1652—1738)作为出版商而在家谱中荣耀一时之际,徽州书籍的辉煌时代也终结了。换言之,徽州所出的美轮美奂的书籍是不同人群合作的结果。从书籍史的角度来看,作为书籍印刷中心,徽州远不如其他地方那样具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它是“非中心”,或是各种关系的交叉点,因此非常错综复杂。

- 6 在包筠雅关于四堡的著作中,她指出近代本地刊刻书商人可以在自己的书店里进些外地印制的书籍:离开四堡的时候他们携带雕版印刷的书籍,回乡的时候,他们还带有纸张和其他产品,包括一些机器印刷的图书。参见 Brokaw, 2007, 页 238。因此 20 世纪之初,徽州人也可能将上海印刷品带到当地。
- 7 参见 Michel Espagne(埃斯帕涅)的文章,《文化转移和书籍的历史》,载韩琦、米盖拉主编,2008 年,页 209—225。
- 8 明代汪机医书的版本尺寸多样性可作为一个实例,参见韩琦、米盖拉主编,2008 年,页 78—80。
- 9 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这一论题未能得到充分的研讨。在研究徽州的教育问题的作者中,许多关注版本问题,尤其是宋代的版本,我们从刘祥光的博士论文(见 Liu Hsiang-kang, 1996)多处及李琳琦的著作中均可见一斑。
- 10 这一部分内容也包括了卞利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徽学》,2008 年 6 月,第五卷。但作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和法国远东学院合作项目的组成部分,我们仍然决定将这篇文章在本辑发表一次,因为该文章是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同时,因为家谱在徽州研究中地位重要,这篇文章可使读者能够看到更完整的徽州古籍、印刷品的述说。本辑收录卞利的这篇文章时对原文有所删节。关于家谱的编纂,参见赵华富(2004 年,第四章,徽州宗族谱牒)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载《中国谱牒研究》(1999 年)。
- 11 我们在此引用了其他综述,如朱万曙(2005)或唐力行(2003)。
- 12 关于中国及西方书籍史参考书目,可参见韩琦与米盖拉主编(2008):《西方书籍史参考文献》、《中国、日本书籍史外文参考文献》、《中国印刷史、书籍史参考文献》,页 255—303。
- 13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王菡先生审阅了贾晋珠的翻译文章,而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卓立博士、法国远东学院华澜先生则审阅了周绍明的翻译文章;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吴旻翻译该前言的第一稿。
- 14 同一研究计划下还有西文研究文章将在 2009 年的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法国远东学院期刊)要发表。此外,米盖拉和鲍国强等人正在作有关徽州家谱的数据库。

参 考 文 献

BROKAW, Cynthia Joanne,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文化的买卖:清朝民国时期的四堡商

- 书),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韩琦、米盖拉主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 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LIU Hsiang-kuang, *Education and Societies :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 at Huizhou, 960—1800* (教育与社会:960—1800年徽州官方与私人教学机构的发展),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 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
- 唐力行:《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2,页67—72。
- 徐学林:《徽州刻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 朱万曙:《徽学与当代学术》,《学术界》,2005年,1,页115—123。
- 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
-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从敦煌到徽州：中国最早印刷品地理分布略论

戴仁(Jean-Pierre Drège)著

吴旻 译

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及其初期不仅是老生常谈,而且也是非常不易的话题。正如许多其他发明创造一样,很难对印刷术的诞生给出一个确切的时日,并且首先需要区分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其中后者开始于公元 11 世纪,相对来说较为人所知。然而本文所要进行探讨的却正是前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雕版印刷的书籍。尽管一个世纪以来,为重寻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却始终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每当有文献提及在某个时代存在以某种形式的雕刻木板将文字或图像复制到纸张或纺织品之上,每当有能够断代或是不能断代的类似印刷实物在中国或是在日本、韩国发现之时,上述论战又会再次如火如荼。事实上这些文献或是实物与其说属于印刷术的第一阶段还不如说是属于它的“史前”阶段。曾几何时,对于印刷术起源的讨论转向或是偏移到了“印刷术的史前史”,试图寻找那些对于雕版印刷术的诞生产生过影响的因素,其实际目的都是将最早使用雕版印刷技术的时间提前¹。于是在这一研究领域里,我们看到了诸多大家如卡特(Thomas F. Carter)²、伯希和(Paul Pelliot)³、张秀民⁴、李书华⁵、钱存训⁶。从此印刷术在时间上被分成两段:第一阶段是印刷术的各组成要素陆续成型的过程,这些要素由不同物质组成,根据其性质的不同,或为基础为工具,或为形式为内容;第二阶段则是随着雕版印刷书籍的出现真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界限究竟定在何处则随着新史料或是新实物的发现而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借助一块块雕刻出来的木板进行印刷的技术,而是将这种技术运用于复制书籍,即作用于一批装订好的纸张并且是一定长度的连续文字的载体。

近年来,有关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也有针对从唐代至宋代的早期印刷书籍的。在中国、日本乃至西方,研究课题或侧重于印刷技术,或侧重于